

七十年来国内学者《边城》研究述评

杨瑞仁

(吉首大学文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摘要:概览七十年来有关《边城》研究的论文、论述,其主要兴奋的视阈可归纳为牧歌—乡情说、悲剧说、象征说与文化—历史批评等三种类型。研究者认为,一部《边城》,牧歌—乡情是主调,主调下演绎着一幕悲剧。整个小说有浓重、深刻、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方面用文化—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审视,就看得尤为清楚。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牧歌;悲剧;象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740-06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问世七十余年了,国内关于《边城》的研究亦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程。据粗略统计,研究《边城》的专论文章有四百余篇,沈从文研究专著设专章讨论《边城》的有十余部,在其它文章和专著中涉及讨论《边城》的有数千处,这些论文、论述涉及的问题极多,质量良莠不齐,水平高下不一,相同意见反复出现的现象较多。这里仅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论文、论述加以爬梳、整理。又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这里先选择出现概率最高的一些观点和理解,将其归纳为牧歌—乡情说、悲剧说、象征说与文化—历史批评等三个类型,分别加以评述。从牧歌—乡情说、悲剧说、象征说与文化—历史批评等三个类型来看,研究者常常互少答腔,各唱各调,但综合起来审视,却可大致获得一种基本认识,即:一部《边城》,牧歌—乡情是主调;主调下演绎着一幕悲剧;整个小说有浓重、深刻、多层次的象征意义,这方面用文化—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审视,就看得尤为清楚。本文即以此为线索,勾勒《边城》研究这三方面走过的历程,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解读这一饮誉中外的名著。

一、牧歌——乡情说

“牧歌”是一个舶来的西方文学术语。英文为 *pastoral*,意为牧歌、田园诗,亦有人用 *idyllic*(意即牧歌的、田园诗的)来指称这类作品。在西方,牧歌是一个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品种,几经演化,后被用来

泛指一切美化乡村生活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里,牧歌与田园小说、田园诗常常串用。但牧歌似乎比田园小说、田园诗这些概念更能反映中国现代文学乡土抒情的本质并揭示其意义。因此,牧歌使用的概率相对稍高。

将《边城》与牧歌联系在一起,据现在掌握的资料,最早是由汪伟发表于1934年6月7日《北平晨报·学园》的《读〈边城〉》一文提出。他赞叹《边城》里描写的风土人情充满了“牧歌情调”,他说:“《边城》整个的调子类牧歌,可以说是近于‘风’的,然而又觉得章法尚严,针线尚密,换言之,犹嫌雅多于风。”继而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一文中说:“《边城》便是这样一部 *idyllic* 杰作。这里一切谐和,光与形的适度配置,什么样人生活在什么样空气里,一件艺术作品正要人看不出艺术的……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现代大都市病了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服可口的良药。”^{[1](69)}四十年代,沈从文写的《水云》出现了“牧歌”一词,表现出对《边城》牧歌属性的自觉。他说:“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然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2](110)}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沈从文的作品受到冷遇和批评,牧歌情调成了罪名之一,以至于将沈从文的作品从文学史视线中放逐,更无讨论余地。但域外和中国港台一些学者接过“牧歌说”的接力棒,用以表达他们的理解,其中美国夏志清和中国香港的司马长风的评论较有代表

性,容另撰文评述。

改革开放以后,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得到重新评价。在沈从文研究方面,凌宇取得了突出成就。凌宇依然肯定《边城》的牧歌情调,听到了《边城》里“清越的牧歌声”。但他更注意更强调“清越的牧歌声里夹着不谐和的现代杂音”。这“不谐和的现代杂音”具体表现就是“横在翠翠和傩送之间的那座碾坊”。凌宇指出:“沈从文不忍心让人心的丑与恶直接出面来破坏美与善,以致这一重大的现实社会因素在表现上,几乎淹没于环境的牧歌情调里。”^{[3](295)}之后,《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较多,但多属于蜻蜓点水式或走马观花式,缺乏展开论述的篇章。

90年代,对《边城》的“牧歌”讨论,稍有展开和深化,杨义和钱里群等的论著是这方面的代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设专章讨论“京派”“海派”,其中设专节讨论沈从文的作品。在沈从文专节全部三个小标题下都谈《边城》。杨义认为,在以《边城》为代表的这类作品中,沈从文“他写‘实’以展示边地带有质朴的氏族社会遗风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他写‘梦’,从这种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形态中幻化出自在状态的纯人性和牧歌情调的纯艺术,以寄托自己别有见地的社会、伦理和审美理想”^{[4](619)}。我们注意到,在杨义的论著中,“牧歌”一词似乎是用来补充说明“田园小说”体式的。他用牧歌的时候,都加上情调二字,组成“牧歌情调”。又如,他说:“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4](632, 616)}关于“田园小说”体式,杨义这样说:“从乡土题材蒸馏出田园小说的灵感,起始于废名,大成于沈从文。”^{[4](616)}杨义也用“诗体小说”来称“田园小说”。依鄙人陋见,“诗体小说”易误解为“分行韵文小说”,还是用“诗化小说”“诗性小说”指称这类“田园小说”为好。同样的用法亦出现在钱里群等人著的《中国现代小说三十年》中,只是稍有差异。钱里群等人用“诗体乡土故事”“诗小说”来指称《边城》这部“‘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不过钱里群在稍后主编的“诗化小说书系”总序中,已明确将《边城》一类小说称为“现代抒情小说”或“诗化小说”^{[5](3)}。钱里群等人著《中国现代小说三十年》中,将沈从文列专章介绍,对沈从文创作价值的认识有所提升。

二十一世纪初,刘洪涛对《边城》的“牧歌说”进行了较全面、较系统的阐释。刘洪涛经多年的研究,2002年在《文学评论》第一期推出了他的力作《〈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这是他献给沈从文百年诞辰

的一份厚礼。该文考察了“牧歌”这一术语的来龙去脉,认为“《边城》是体现牧歌这一抒情特质的典范之作”。接着他从《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入手,对《边城》艺术的独创性和意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文章认为:《边城》“首先构筑了一种乐园图式”,《边城》人物的诗意造型再辅以自然胜景,让人有美不胜收之感。乐园图式中的自然崇拜和刻意展示,在《边城》里发展得淋漓尽致。而“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作者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Q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文章说:“我认为国民性中不仅有劣根性的一面,还应该包括姑且称为优根性的一面。沈从文的小说大约与鲁迅同时代,不过一个写浙东,一个写湘西。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另一些中国人,他们非常安祥、和谐、善良,恰恰就没有鲁迅小说中劣根性的东西,把两位大师的小说放在一起谈,可能会帮助我们得到国民性的完整形象。”文章认为: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接着作者结合沈从文创作道路阐释了他塑造中国形象的内在动力。因文化守成主义思潮的外部环境推动作用和沈从文从思想到艺术的高度成熟,“《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6](74)}。刘洪涛的论文高屋建瓴,从牧歌入手分析,得出了诗意中国形象的结论,驱散了笼罩在《边城》上空的迷雾,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另外,他将鲁迅的阿Q形象与沈从文的诗意中国形象并列,说明一个劣根性和一个优根性恰好合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不但阐释了《边城》的文学意义,而且稍带肯定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

与“牧歌小说”相近的是“乡情说”。“乡情说”论者认为:“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了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是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风情画卷。”^{[7](14)}但这些描写“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思古怀旧,而是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企图将过去的生活的美对照当前现实的丑,让人们来鉴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从而启发人们弃恶向善,舍丑求美。”^{[7](15)}刘一友发表于《吉首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的题为《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创作》的文章

进一步认为:乡情促成了《边城》中风景和风俗的饱和描写,使作品成了“东方风习的化石”^{[18](4)},乡情既是作品的基本特征,还是《边城》乃至一切乡土作品的动力性因素。“乡情说”从另一侧面证明沈从文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可看成是“牧歌”说的一个补充。

二、悲剧说

《边城》究竟是牧歌还是悲剧,按刘洪涛的意见,两者并不矛盾。因为“牧歌并不限于表现乡土喜乐,它本身也含有悲剧成份”,牧歌“不拒绝衰败和忧伤”。这一认识是有根据的。牧歌起源于古希腊,创始人忒奥克里托斯在他的诗中,既歌颂宁静悠闲的牧人生活,又有表现失败与死亡的哀歌或挽歌。关于《边城》牧歌与悲剧的关系,刘洪涛用“乐园—失乐园结构”“从乐园到挽歌”来概括。其实《边城》表现的乐园和挽歌(悲剧)还是有主从关系的,《边城》的悲剧从属于喜乐牧歌还是他文章的基本思路。刘洪涛认为,《边城》忧伤和凄婉(悲剧)来自于现实的、命运的和象征的三个层面。从现实层面看,主要是以“碾坊所代表的金钱关系对纯洁爱情的破坏”;从命运层面看,主要表现为一系列的误会;从象征层面看,主要通过借用失乐园图式、大洪水意象等来表现^{[6](71)}。刘洪涛对《边城》悲剧的认识比较全面。对《边城》的悲剧认识,往前可追溯到七十年前汪伟的《读〈边城〉》。汪伟的文章虽没有说得很分明,逻辑思路大致如此。他在肯定《边城》整个调子类牧歌的前提下认为:“《边城》也可以说是淡淡的一幕悲剧。”进而他认为,“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天保大佬的失恋”^{[11](36)}。刘西渭意见类似,他也是在肯定“这里一切谐和,一切合乎自然”的田园诗前提下,指出了《边城》含有的悲剧成分。他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份量”。刘西渭比汪伟在认识上深入了一步,他认为“这种悲哀,不仅仅在于情节的演进,而是在于带在人物的气质里”。刘西渭还指出“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11](69)}。这种命运的悲剧,后来沈从文在《水云》中的阐释为:“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19](111)}不凑巧即偶然,偶然即命运。沈从文说的就是一个命运问题。但凌宇认为:悲剧并不全出

于“偶然”。“构成作品情节冲突的,是人物主观精神上对爱情的自由追求,与这种追求在客观现实中难于实现的矛盾”。这种现实的阻碍就是“在翠翠与傩送之间,站起了哪座碾坊,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的上面,凝聚了封建买卖婚姻的本质”。就因这一较为“隐蔽”的物化人格力量“结合着人生中的‘偶然’与人心的隔膜起着兴风作浪的作用,以至彻底地摧毁了老船工生命的航船”。凌宇的分析涉及到命运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因素。另外,对翠翠父母当年的爱情悲剧,他认为:“无论哪种情况,都反映着封建宗法关系的制约。”^{[3](243)}时隔二十年,凌宇又推出了“《边城》在骨子里,是一场苗汉文化冲突的悲剧”的新观点。他认为湘西的历史,是一部土家族、苗族、汉族互动的历史,而《边城》内蕴的苗族文化内涵,可从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从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的车路—马路、碾坊—渡船两组意象得到充分证明。正是湘西土著民族不为人理解的千年孤独感“成为《边城》人物的情感基调,并恰恰源于人与人之间因文化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最终落得翠翠在渡口孤独地等候傩送的归来”。凌宇认为:《边城》人物的孤独感直接融入了沈从文内心的孤独,这恰好应了朱光潜说的翠翠的性格“显示出沈从文自己方面的性格”。因而《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心坎里那股沉郁隐痛……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10](9)}。在贺兴安的专著《沈从文评论》里,贺兴安从沈从文“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的感叹出发,专节阐释“善的悲剧”,他分析这种悲剧与西方传统悲剧的差异,指出:因它(“善的悲剧”)的平实,更为普通人所理解,所接受。贺兴安挖掘较深之处,在于指出《边城》中“‘善’的悲剧情调又是同作者的泛神论的哲理感悟相融汇的”,具体表现在作品中的人与天心领神会,日头似乎通人性,黄狗也写得极富灵性,“作者是有意识将自然力的破坏同‘善’的不幸布置在一起,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11](84-87)}。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沈研队伍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一反传统的研究方法,注重一些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陈改玲的论文就是一例。她不去探讨小说的高深意义,仅从小说的故事层面入手,将《边城》世界给予还原,亦即从编故事角度来看《边城》中人物如何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而形成悲剧的。经过还

原从而得出这样结论：“顺顺对爷爷的责怪，是给自己对碾坊的觊觎找一个借口。二佬也同样是不愿面对因自己参与竞争使哥哥抱憾而死这一事实。”“在《边城》构筑的爱情神话中，十几年前，翠翠母亲以牺牲亲情随恋人而去；十几年后翠翠与二佬的这场爱情仍然是亲情来换爱情，只不过死者由情人置换为亲人。十多年前的那场爱情，男女双方用‘死’来获得永生；十多年后的这场爱情，男女双方又都‘坏了’一位亲人，从而构成一种平衡”^①。沈研新人的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三、象征与文化—历史批评说

沈从文曾痛感人们不能理解他的作品，他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2](44)} 呼应沈从文这种感叹的就是朱光潜在《沈从文的人格和风格》中对《边城》所作的概括，“它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13](3)}。沈从文的感慨和朱光潜的论断引导人们进一步探讨《边城》深层次的蕴涵和象征意义。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注意到沈从文作品中象征手法运用和作品的象征意义的，还是域外学者。国内较早对此关注的，凌宇可为代表。凌宇在他的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中“象征的抒情”一节里讨论了沈从文作品的象征问题。凌宇认为：“象征，是沈从文小说意象构成的重要因素”，“到《边城》和《长河》里，象征与抒情成为小说艺术构成的主导因素，而且作品中作家的主观内心情绪，对象化为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图景，并且，这种抒情，又是通过作品意象的整体象征来实现的”^{[3](292-294)}。接着出现了丁兴标的文章，丁兴标运用结构主义批评方法，把《边城》分成表层和深层两种主题结构来分析，他指出：从《边城》表层来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然而通过这个象征的框架，它不仅象征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及其无可换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作者一向追求的重塑民族形象，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同时，它还隐含了作者本人为民族、为整个人类的未来而焦虑的忧患意识。^{[14](3)}“象征说”论者从“象征”入手触及了《边城》的深层意

义，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二十一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学的勃兴，人们试图用文化批评的方法进一步解释沈从文，解释《边城》。文化—历史批评是一种宏阔视野，没有一叶障目之弊，对长期受禁锢的批评界，无异于一剂良药。韩立群的专著《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是把文化理论用于沈从文批评的最早成果之一。韩立群从文化学中人生普遍形式论着手，指出：《边城》的主旨之间确在着力表现人生形式而非如一般小说集中于写人物性格，一般社会小说只有人物一类角色，自然文化等因素被作为陪衬人物的环境而描写的，而在《边城》中作为主要角色出现和被同样表现的却是人物、自然、文化三类形象。它们恰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作者所构想的人生形式的内容。“这种和谐的人生形式的构建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从文化改造入手改造社会的美好愿望和理想……因此，作者关于文化改造的构想，不仅在历史上有着启蒙意义，而且在经济制度根本变革的今天也有一定实践意义”^{[15](75)}。

汪曾祺则在《又读〈边城〉》中提醒人们，“‘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16](586)}。继而向成国在他的专著里以“《边城》——乡村儿女生存的文化选择”为题，设专节讨论《边城》文化问题，他认为，因沈从文的《边城》而形成了一种“边城”观念，“《边城》，不仅现实地形象地表现出‘边城’地区的人事哀乐，更为主要地表现出这些人事哀乐故事所指向的深远的文化选择”^{[17](341)}。从观点提出的先后顺序来看，可以说向成国用文化理论阐释了汪曾祺“边城——一个文化概念”的命题。

本文开头提到的刘洪涛的论文，其中部分论述也使用了文化—历史批评方法。他把《边城》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放在此进程中激起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来观察，阐释了《边城》中国形象形成的外部环境。而较系统使用文化—历史分析方法阐释《边城》的，要数刘永泰发表在《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坛文集》中的《〈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一文。该论文分为“是怀念，更是抵抗”“是悲伤更是背叛”“两种旋律”“理想主义的现代化”“日益清晰的真面目”等五节来讨论《边城》。全文把《边城》放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和中国的被动

现代化进程中来解读。文章认为:宣泄内心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才是作家创作《边城》的深层的根本动机。沈从文曾提起的湘西的堕落只能算是一种触媒,一种契机。所谓民族品德的重造只能算是表层动机。作家深层的创作动机是“抵抗”。这种“包含有本能和湘西在内潜意识因为《边城》的创作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包含有现代化内容的意识的重压,从而缓解了内心的重压。用作家在《水+云》中的话说即是“将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后生命得到了平衡”。文章认为:《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更艺术地表现了作家面对这场变故而生的真切感受。它是唱给残败湘西的挽歌,但更显示了作家精神世界中理智对情感的又一次胜利,顺从了现代化的要求。同时认为:《边城》中轻柔、平和、明快的弦律,实际已上升为中华民族牧歌般的思乡曲。另一种则是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其实是中华民族农业社会瓦解的挽歌——全民族隐秘的心声。挽歌中现代化社会在农业社会的废墟上建构起来。《边城》中的白塔坍塌和重建象征着传统湘西的覆亡和现代湘西的重造,预示着中华民族衰败后获得新生,还可能表明作家为中华民族热切呼唤着现代化的宁馨儿。文章还认为:《边城》表现出的现代化模式是理想主义的,是无法实现的,它只能在想像的艺术世界中放射理想的光辉而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它具有审美价值而不具有科学价值。《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已经颠覆了的,但它们却又是现代人极想拥有极为珍视又极为缺乏的。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因此而有了巨大的审美价值。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农业社会,照亮了作者和接受者幽暗的心灵世界,它还将继续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永远、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②。刘永泰不玩文字游戏,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实实在在把《边城》放在中国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审视,纳入到现代化的经验系统中来解读,出现了不少新的见解,给人以启发,值得推荐。

以上是仅就《边城》研究兴奋区三种类型所作的大致扫描。从七十年余来研究进程的时段特征可以看出,时间进入21世纪,《边城》研究已经有了突破

性的进展,整个研究水平登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边城》是一部形象真切、甘美、圆润而内蕴十分复杂、深远、深厚的杰作。“这是一颗千年不磨的珠玉”,刘西渭在1935年作出的这一评断,不能不说极有见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边城》必将焕发出更加夺人的光辉。

注释:

- ① 陈改玲《边城》研究三题,载《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文集》,第223-229页,渝秀新出内准字(2002)15号。
② 刘永泰,《〈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载《永远的从文——沈从文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论文集》,第238-248页,渝秀新出内准字(2002)15号。

参考文献:

- [1]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C]//沈从文研究资料(上集).广州: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
[2]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10.
[3]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 钱里群.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诗化小说研究书系》总序[C]//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南昌: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
[6]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71-75.
[7] 何益民.论沈从文的《边城》[J].湘潭大学学报,1981,(1):13-16.
[8] 刘一友.论沈从文的乡情及其《边城》[J].吉首大学学报,1985,(3):16-20.
[9] 沈从文.水云[C]//沈从文全集(第2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11.
[10] 凌宇.沈从文思想价值论[J].文学评论,2002,(4):8-13.
[11] 贺兴安.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
[12]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C]//沈从文文集(11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3] 朱光潜.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C]//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7.
[14] 丁兴标.《边城》一段往事,一个喻言[J].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3):3-7.
[15]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16] 汪曾祺.又读《边城》[C]//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
[17] 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M].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Review of domestic scholars' research on "*Border Town*"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YANG Ruir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Reviewing the theses about "*Border Town*"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main points could be classifi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features: pastoral, tragedy, symbolism and cultural-historicism. In the researcher's point of view, the tone of the story is pastoral, under which a tragedy is implied. The novel harbors profound, deep and multi-level symbolic meanings, which would be made clear by interpreting from an aspect of cultural-historian.

Key words: Shen Congwen; "*Border Town*"; pastoral; tragedy; symbol

[编辑:苏慧]

(上接 677 页)

- [2] 梁华仁. 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56 - 59.
- [3] 张文显. 法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5.
- [4] 克雷蒂安·冯·巴尔. 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M]. 焦美华, 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527.
- [5] 周伟. 常见医疗事故的鉴识与纠纷处理[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 216.
- [6] 王成. 侵权损害赔偿的经济分析[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198 - 207.
- [7] 王利明. 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 373.
- [8] 沈宗灵. 现代西方法理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41.
- [9] 刘锐.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价值定位[J]. 学术交流, 2006(4): 52 - 55.
- [10] 王泽鉴. 侵权行为法(第一册)[M]. 台湾: 三民书局, 1998: 231.

On the causality of medical damage infringement liability

YU Zhan, FENG Wei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People's Court of Yuelu District,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lative causality, the authors analyse the characters and the modes of many causes of the causality of medical damage infringement liability. And it is proposed to stick to the principles as follows: taking the relative cause into account fully; negligence can not substitute for causality; bearing the weight of merits; enriching feasibility of the expression of probability, which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judges to make more reasonable and accurate judgments in the medical damage disputes.

Key words: causality; medical damage; infringement liability

[编辑:苏慧]